

# 谈谈白莲教襄阳起义军的 布告与口号

张兴伯 张革非  
杨 田 秦宝琦

1796年（嘉庆元年）爆发的以川楚陕豫甘为主要战场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历时十年，是清代中期农民阶级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这次起义的口号，在已发表的著作中，都认为是“官逼民反”。虽然“官逼民反”是起义军中普遍用以号召农民群众起义的口号，但它不是这次起义的唯一口号，也不是明确地反映这次起义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口号。档案文献和图书资料分散地记载着有关这次起义口号的一些情况，特别是1797年襄阳起义军张汉朝所部的布告，对我们了解起义军的口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1797年5月28日（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湖北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张汉朝所部，在陕西省兴安府贴出了布告：

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巾、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象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大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兵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恻）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恩。谨遵勿违！计开：三十六路都先锋张世龙、副张世虎、五营总正副住襄阳城东黄龙坞詹世爵、刘永盛、刘永太、刘起革、周天绪、许朝恒、李淮、李潮、阮学盛、阮正龙、张什、廖上学……①

① 奏承恩嘉庆二年六月初七日咨送的“匪犯逆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明清档案部档案，下略。）

欽命東主使漢賊滿張漢列子為松村捕犯都打大元帥張月梅等千意沈順兵丁為天大軍  
 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勿謂傳言果不濟河更見吾等旗衣俱白目為黃雲赤眉之流皆因吾  
 主大考各營服李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現氣運既衰天心不順已為我漢家之天下吾  
 主本大明之精精小等特入明之故民無不思求源本本之救扶老携幼何心遠近各等通情是夜  
 之凡小民見現身身扶杖俱金寶非本帥本意皆因尔等之卡為助官血戰小等定住真運到  
 各安本業勿助官兵勿信御勇吾自測門相朕救小等同避目前大對得受吾  
 主日後重恩謹道勿違

針明

三十六路都先鋒

張世龍 劉張世龍

副任襄陽城東黃龍塘

唐世爵 劉永益 劉希太 劉起軍

真天榜 許朝坦 李 淮 李 湖

阮李盛 阮正龍 阮 什 袁士李



右 仰 通 知

年 月

示 貼

白蓮教襄陽起义军的布告原件摄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这是一份可贵的完整的白莲教起义军布告。它是用糯米饭粒粘贴的。陕西巡抚秦承恩在呈缴这一布告的内封上写道：“此头股楚匪五月初三日在兴安。”<sup>①</sup>关于张汉朝这次率领起义军在兴安府地区的活动，据《续兴安府志》记载：“嘉庆二年四月，贼张月梅率党扑金坪。”“嘉庆二年五月，……张汉朝至恒口”。<sup>②</sup>这张布告，就是起义军在这期间的珍贵文物。

布告指出，襄阳起义军张汉朝所部即襄阳蓝号，在1797年共分五营、三十六路，这是了解这次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组织情况的重要史料。布告所记录的襄阳蓝号起义军领导人的姓名，也是现存文献中罕见的完整的名单。而且提供了每个人名的确切写法，从而纠正了在奏折、上谕和私家著述中不确切的记载。关于布告对于了解起义军口号的史料价值，试谈如下。

### （一）“兴汉灭满”

布告明确地宣称，起义是为了“兴汉灭满”。这表明，湖北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重要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关于这一口号，在《罗壮勇公年谱》中也有生动的记述。四川起义军领袖罗其清曾在方山坪对罗思举说：“尔既有四万人之众，即可兴汉灭满。”<sup>③</sup>由此可见，“兴汉灭满”是白莲教农民起义军中普遍使用的口号。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以满族贵族地主为首的各族地主阶级的专政。封建帝国内部的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是共生的。民族压迫的基

<sup>①</sup>秦承恩嘉庆二年六月初七日咨送的“匪犯逆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明清档案部档案，下略。）

<sup>②</sup>叶世倬，《续兴安府志》卷六。

<sup>③</sup>《罗壮勇公年谱》上。

本内容，对于劳动人民说来，就是阶级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sup>①</sup>清代封建社会的农民不可能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民族压迫同样不可能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只能直觉地认识自己身受的灾难。起义的汉族农民首先将清朝的民族压迫看成是灾难的来源。“兴汉灭满”这一口号，表明起义农民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满族贵族当皇帝的清王朝，表达了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战略目的，而成为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起义的重要的革命口号。

清王朝在地主阶级内部突出满族的特殊地位，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制和笼络汉族地主使之就范，在满汉地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兴汉灭满”这一口号，也反映了利用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分化敌人的策略。布告中“尔等皆大明之故民”以下的部分，就是这一策略思想的具体阐述。

布告不自觉地以强调民族矛盾的方式来反映要推翻清朝统治这一农民阶级斗争的根本内容，是因为对以满族贵族地主为首的地主阶级专政缺乏本质的认识，这是农民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实际战斗中，起义军与之战斗的对象，除八旗兵之外，则主要是绿营兵和汉族地主团练的乡勇。起义农民的政治面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只是他们并不能自觉地认识这些。

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在提出“兴汉灭满”口号时，还提出了“尔今，真明天子已出”，“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作为依据。这与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宣传的牛八、李犬儿的人物是一致的。这种皇权主义思想在农民起义军布告中明确地表

---

<sup>①</sup>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8年8月8日）。

现出来，不是偶然的。因为农民阶级在当时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又不体现新的生产力，“农民和小生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sup>①</sup>农民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农民不能创造新的社会制度，皇帝成了农民思想中国家政权的体现。当起义农民用武器批判清王朝和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时候，他们憧憬的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的影响，仍以农民所拥戴的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

## （二）“替天行道”

布告指出的清王朝“气运既衰，天心不顺”，是天命思想的反映。它具体来源于起义准备过程中编造的关于弥勒转世辅保牛八、李犬儿的宗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替天行道”这一口号。有的起义队伍还把它写在旗帜上面，转战各地。<sup>②</sup>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推翻“气运既衰，天心不顺”的清朝统治。

“替天行道”动员农民群众参加起义，鼓动他们坚持斗争，并且是反对投降主义的武器。当南充知县刘清到香炉坪展开“招安”攻势时，川陕白莲教领导人之一孙士凤大义凛然，怒斥说：“这是‘替天行道’，……万难投诚”。<sup>③</sup>

起义农民利用天命思想来体现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口号，是因为农民的主观世界中存在着天命思想，这与农民迷信宗教出于同一社会根源。农民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这一阶级局限性，是农民有天命思想的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则是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利用封建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落后和愚昧，极力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6页。

②刘绍文，《城口厅志》卷十二。

③《罗壮勇公年谱》上。

农民灌输封建王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之类的天命观而产生的影响。所以列宁说，神的观念“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sup>①</sup>天命观这一唯心主义思想，曾经是地主阶级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当农民提出“气运既衰，天心不顺”，要“替天行道”举行起义反对清朝统治时，就意味着农民在主观世界中挣断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的精神枷锁。虽然“气运既衰，天心不顺”、“替天行道”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天命思想，但当它与农民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就起着反对清朝统治的作用，与黄巾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所起的革命作用是相同的。

天命思想不但形成为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口号，还是制定年号的依据。林之华、覃加耀领导的湖北长阳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就曾宣布以“天运”作为年号。<sup>②</sup>

### （三）“官逼民反”

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许多队伍，打着“官逼民反”的旗帜进行战斗。<sup>③</sup>这一口号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对清朝反动统治的忿怒控诉，也是爆发这次起义的革命形势的概括说明。

在乾隆末年，川楚陕广大地区农民的处境凄惨万状，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1795年（乾隆六十年）爆发了贵州、湖南苗民起义。清朝统治者急忙从湖北、四川等省抽调大量的军队去镇压。湖北诸标营兵“十不存三”。<sup>④</sup>在驻军空虚的情况下，湖北、四川的地方官吏不是用一般的办法，

①《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1页。

②覃加耀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③王廷诏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④《彝山毕公年谱》。

而以缉捕白莲教徒为借口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来维护当地的封建秩序。在襄阳，“嘉庆元年有本县匪棍李奎、刘相、刘大刀奉县主给顶戴、令旗，同捐职理问刘滋、牌甲刘二贼，沿乡托名查拿邪教。李奎等借此勒索，贿赂即为良民，无交财即为教匪，混行擅杀，抄掳家财，作践妇女。”<sup>①</sup>武昌府知府常丹葵甚至“在宜都县任意搜拿并用惨刑，以大铁钉生钉人两掌，以铁锤击人足骨立断”。<sup>②</sup>“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未至而……就毙大半，余全歿狱中。”<sup>③</sup>清朝官吏的凶残横暴令人发指。他们妄图用此弹压局势，结果事与愿违，使农民面临的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因而更加激化。形势的客观变化，促使农民的主观变化急剧地发展着。参加白莲教的农民被迫迅速起义，“被拿情急，起意谋反”。<sup>④</sup>没有参加白莲教的农民也不得不走上参加起义的道路。

“始初并未习教，实因达州知州戴如煌遍拿邪教，受累不堪，故尔起事。”<sup>⑤</sup>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额勒登保承认：“未起事之先，地方官借教匪为名，多端逼勒，使之不反不止。”<sup>⑥</sup>由此可见，“官逼民反”这一口号，直觉地表达了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官逼民反”的旗帜飘扬到哪里，就在哪里的苦难深重的农民群众中引起共鸣，而成为动员成千上万农民参加起义的主要口号之一。王三槐被俘后利用“官逼民反”取媚于清朝统治者，并不代表“官逼民反”这一口号的实质，而是他对农民起义的背

①李潮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②常丹葵供词 问条。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③《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给事中谷先生家信》。

④李淮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⑤王登廷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⑥《经略额威勇侯奏议》。

叛，说明在起义队伍中存在着对于这一口号的两种不同态度。清朝统治者对王三槐的态度颇为欣赏，就像快要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左一道上谕，右一道上谕，谴责贪官酷吏，利用王三槐的语言广泛地进行宣传，妄图将起义农民反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引向只去反对贪官酷吏，在政治上瓦解起义队伍。这一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与王三槐合营的冷天禄、徐天德以及其他起义的大多数领导人和广大起义军战士，虽然在思想上不认识“清官”的阶级实质，在实践中有的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刘清之流的蒙蔽，可是在革命与投降这一原则问题上，同王三槐的态度是对立的。他们把“官逼民反”与“兴汉灭满”联系在一起，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即将之统一于推翻清朝统治这一战略目标之下。白莲教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坚持战斗达十年之久，和这种反对投降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

布告明确地指出，起义军所以“焚杀俱全”，“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兵血战。”说明起义军所打击的是与起义军对立的维护封建秩序的各种势力。对于不与起义军为敌，“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的人，起义军不但不打击，并且得受“日后重恩”。这是对清代官方文书和某些私家著述诬蔑起义军“嗜杀成性”的严正驳斥。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文献、图书记载可以佐证。1796年5月12日（嘉庆元年四月初六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在奏摺中写道：“据文图查获伪示一纸，送臣阅看，系禁止抢夺奸淫等款”。<sup>①</sup>1797年8月1日（嘉庆二年闰六月初九日）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布告，全部是起义军应当遵守的纪律，十分严明、具体。<sup>②</sup>起义军经过的地方，农民生活稳定。“嘉庆二年白莲教自楚入兴安、汉中界，蔓延至八九年乃奏肃清，山南之民移

<sup>①</sup>秦承恩嘉庆元年四月初六日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sup>②</sup>白莲教起义军告示。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家出栈者无十家。其农民皆种桑植木，耕获不以寇废。”<sup>①</sup>起义军不但保护农民生产，还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独学老人年谱》中，就生动地记述了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分土地的号召。湖北起义军的一位成员也说：“事成之后，分给小的地亩。”<sup>②</sup>因此，农民“其心甚愿贼来，迨贼来而困散矣。”<sup>③</sup>

最后，对于布告以及它帮助我们了解的上述口号，还必须与这次起义的全部斗争过程，特别是流寇主义农民战争这一特点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准确地认识起义的斗争水平和布告在起义中的历史作用。

---

①岳震川：《送叶建庵入都序》丁卯。

②王义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

③甘家斌《邻水县志》卷二。